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

——基于数字金融与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刘 伟，牛文奇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如何保障农村居民生计可持续发展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层面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农村家庭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但对其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信贷约束和提升家庭金融脆弱性抑制农村家庭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促进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且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过程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西部地区、青年户主、低人力资本和低收入农村家庭的农业型生计策略抑制作用更显著，对中西部地区、青年户主、高人力资本和低收入农村家庭的非农型生计策略促进作用更显著。鉴于此，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确保经济政策的平稳性和连续性，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优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农村家庭；生计策略；数字金融；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3；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5）06-0112-14

一、引 言

新时代背景下，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增进民生福祉，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战略目标。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目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但仍然存在农业生产效益不高、农民收入增速放缓、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缺乏以及农户生计脆弱性较高的情况，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稳步提升农村家庭生计水平，加快农村家庭生计策略转型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外部风险应对能力，对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文豪等，2023）。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JY040）；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专项（ZR2024QG241）；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QDSKL2501092）。

作者简介：刘伟，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创新管理。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着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自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全面加征关税，导致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一系列外部冲击加剧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面临显著的下行压力。为应对外部多变局势，国内经济政策随之频繁调整，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这不仅对产出、就业、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造成负面影响(Baker et al.，2016；金雪军等，2014)，还会传导至微观农村家庭，对农户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长期则会影响其可持续生计发展。由于农村家庭生计资本相对匮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会加剧其生计脆弱性，进而影响生计决策。因此，深入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机制，不仅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精准的经济政策，也为农村家庭合理选择生计策略提供重要参考。

二、文献综述

生计策略是指个体或家庭为实现特定生计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和活动组合。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冲击以及家庭内部的生计资本，共同作用于生计结果(丁士军等，2016)。从外部因素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一种负向冲击，会抑制社会总产出与物价，提高失业率(许志伟和王文甫，2019)，传导至微观家庭造成家庭内部收入减少；同时会抑制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与深度，促使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风险资产配置(刘逢雨等，2019)，进而影响其生计决策。从内部条件看，农村家庭生计策略主要由其生计资本决定。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①，家庭生计资本分为五类：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部分学者研究发现，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影响家庭的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赵文娟等，2015)。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有效推动农户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就业，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向非农转型(伍艳，2016)。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型生计策略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且提升了农村家庭的生计多样性(董晓林和熊健，2019)，降低了农户生计脆弱性。

农村家庭可持续生计发展需要金融支持。然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下，传统金融机构信贷收缩，农村家庭因缺乏抵押品面临更严重的信贷约束(王修华和赵亚雄，2022)，制约农村家庭生计改善。现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风险，可为缺乏抵押和担保的农村家庭提供信贷资金，有效缓解其信贷约束(王小华等，2022)。同时，数字金融拓宽了农户信息获取渠道，提升其金融素养，使农户更易获得正规信贷，并增强农户风险应对能力，降低金融脆弱性(温涛和刘亭廷，2025)。此外，数字金融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农户创业与外出务工，从而有效推动非农就业(田鸽和张勋，2022)。数字金融也会直接影响农村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谭卓敏(2023)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会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非农经营活动，增加其收入来源渠道，从而显著提升家庭生计多样化水平。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社会资本作为家庭的非正式保障机制，依托亲缘与地缘纽带，通过促进就业信息传递与市场机会的流动，显著减少农户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搜寻成本与交易费用，从而降低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涂冰倩等，2018)，为其生计转型开辟可行路径。社会资本基于人际信任的民间借贷与亲友间的转移支付，能够在正规金融服务缺位时，为农村家庭提供应急性的资金融

① 资料来源于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参见http//www.unscn.org/layout/modules/resources/files/Sustainable_livelihoods_guidance_sheets_framework.pdf。

通，缓解其短期流动性约束(张蕴晖和赵伟，2023)。当农户劳动力资源短期匮乏时，社会资本通过资源共享与互惠原则可以有效地给予支持，优化家庭劳动力结构和经济决策(周广肃等，2014)。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围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农村家庭生计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直接讨论二者关系的文献较少，更鲜少有文献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或关注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家庭生计策略选择中的调节效应。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追踪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理论上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并基于信贷约束和家庭金融脆弱性机制，剖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补充和深化理论研究。第二，将数字金融、社会资本纳入分析框架，探讨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中的调节效应，为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提高农村家庭生计水平提供了新的依据。第三，基于农户异质性特征，实证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户主年龄、人力资本水平及收入水平间存在显著差异，为实施精准化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降低家庭农业生产收益、加剧融资约束、增加生计脆弱性对农村家庭的收入和财富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引发农产品价格波动(张俊华等，2019)，导致农业生产收益下降，影响农户收入增长。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型生计策略家庭受到冲击，收入的波动性以及不确定性增加，农户会减少农业生产投资，增加预防性储蓄，平滑未来消费，进而使生计策略向非农型转变。第二，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贷款的违约风险升高，尤其是涉农贷款(尹志超等，2014)。银行会减少信贷供给，从而限制了农村居民的融资渠道。融资约束加剧使得农村家庭无法通过借贷为教育、创业或农业转型进行融资，从而被迫放弃最优投资计划，生计策略趋于保守。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直接冲击农村家庭的生计资本，削弱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尤其是传统农业型家庭因收入来源单一且主要依赖农业生产，其生计脆弱性相对较高、抗风险能力弱，在经济环境恶化时更易受到负面影响。面对生计资本减少和脆弱性增加，农户基于效用最大化理论，会选择外出务工来优化家庭劳动力的资源配置，通过调整生计策略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保障生计可持续性(李玉山等，2021)。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a：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农村家庭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

H1b：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型和兼业型生计策略。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机制分析

1. 信贷约束的中介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加剧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风险的担忧，从而显著抑制信贷供给(Bordo et al., 2016)，同时降低农户收入预期，加剧信贷配给，从而强化其信贷约束。一方面，信贷约束的提高使农户难以获得除满足自身需求之外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入，从而阻碍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抑制家庭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另一方面，信贷约束意味着较低的信贷可得性和流动性约束，直接抑制了农村家庭金融资本的积累，长此以往会破坏其自然资本和人

力资本的可持续性，造成家庭收入减少。因此，农户会采取多样化的生产与经营策略，以实现家庭内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的最优分配，进而保障或改善其生计状况。这种资源优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性，推动生计策略向非农型转变。

2. 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中介效应

家庭金融脆弱性是指家庭在面临内外部经济冲击时，难以维持金融稳定与经济安全的状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增加，直接削弱农户的收入稳定性和资产价值，导致农村家庭资产负债增加，加剧其金融脆弱性。为此，农户采取多元化的生计策略以应对风险冲击，提升生计韧性和可持续性(谭卓敏，2023)。一方面，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提高迫使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减少农业生产性投资。同时会导致农户融资成本上升与信贷可得性下降，并推动其转向非农就业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当家庭处于金融脆弱状态时，依赖传统农业生产和常规就业难以有效改善经济状况或分散金融风险。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理论，农户为降低金融脆弱性，会主动寻求多元化收入来源，非农就业成为突破家庭金融困境的理性选择。在本地就业机会有限的约束下，农户通过外出就业，利用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差异实现收入提升，从而缓解家庭金融压力，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冲击，维持家庭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基于上述机制，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信贷约束和家庭金融脆弱性进而抑制农村家庭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促进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

3. 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农村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和保障。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的地域局限性，使金融服务得以覆盖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并通过其自身优势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家庭生计策略选择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数字金融对非农经营活动效率的促进作用强于传统农业生产活动，扩大了两种经济活动效率之间的差距(Liu et al.，2021)，从而减少了农村家庭对农业的依赖，推动其生计策略由农业型向非农型转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面临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服务的缺失严重阻碍农户参与非农经营活动。数字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包容性，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排斥，为农户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推动农村家庭进行非农创业(杨明婉等，2024)。同时，金融可得性的提高推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化(赵亚雄和王修华，2022)，提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与生计资本积累。此外，数字金融的普惠特性使其发展红利辐射到农村地区，惠及低收入群体，为农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倩等，2024)，增加了农村家庭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进一步加速农村家庭生计策略向非农型转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3：数字金融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的抑制作用，增强对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

4. 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社会资本从多方面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首先，社会资本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促进社会网络中的信息流动，显著提升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效率，帮助农户及时获取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以及政策变动的信息，降低信息交易成本(李晓嘉和蒋承，2018)，从而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其次，当农村家庭面临短期劳动力短缺时，社会资本中的资源共享与互助机制能够提供有效支持，优化家庭劳动力配置和经济决策；最后，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农户的信贷违约风险(廖理等，2020)，促进民间信贷支持，从而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短期流动性约束，并为其提供生计转型所需的资金支持。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H4：较高的社会资本能够正向促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家庭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该数据库覆盖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含家庭、个体、社区层面的详细信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选用其中的2014、2016和2018年三期样本进行研究；宏观地区层面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参考Yu et al.（2021）构建的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字金融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本文样本数据处理如下：首先，选取三期均参加调查的家庭，剔除编码无法识别以及存在缺失变量的样本。其次，本文研究对象是农村家庭，因此剔除CFPS家庭经济问卷中居住地为城市的家庭样本，保留农村家庭样本。再次，为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对部分连续变量实施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保证数据质量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将农村家庭数据与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按照地区和时间两个维度进行匹配，共得到3 859个农村家庭11 569个观测值。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农村家庭生计策略。本文参考Walelign et al.（2016）的划分方法，综合考虑家庭收入结构和成员职业。收入构成方面，选取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作为投入指标；家庭成员职业方面，选取参与农业生产、外出务工以及非农自主经营活动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将3 859个农村家庭的上述指标在2014、2016和2018年的数据作为整体，采用Kmedians聚类分析法将家庭的生计策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各类型的具体特征见表1。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三类家庭在各项投入指标的均值上呈现显著差异。第一类家庭在农业相关指标上表现突出，在三个类型中均值最大，其经营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达到58.54%，同时家庭成员中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高达65.19%，因此本文将该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定义为农业型；第二类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占比高达80.72%，在三个类型中均值最大，且家庭成员中务工人数占比在三种类型家庭中也是最高的，故将该类型家庭定义为非农型；第三类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其他收入占比均较另两类高，故将该类家庭定义为兼业型。

表1 各项指标在不同类型生计策略家庭中的均值 （%）

指标	第一类农业型	第二类非农型	第三类兼业型
农业人数占比	65.19	38.31	32.35
务工人数占比	8.80	33.59	5.56
自营人数占比	7.31	1.24	1.75
经营性收入占比	58.54	7.89	4.65
财产性收入占比	0.97	0.80	3.50
转移性收入占比	9.28	4.44	49.24
工资性收入占比	9.83	80.72	6.97
其他收入占比	3.04	1.06	7.82

2. 核心解释变量

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虑到经济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在实证分析中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滞后一期。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王君涵等，2020），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生计资本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人力资本用户主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性别衡量；金融资本用家庭的现金和存款总额以及贷款总额衡量；物质资本用家庭农机价值、耐用消费品价值以及房屋价值衡量；自然资本用是否拥有自有土地衡量。

4. 中介变量

本文引入信贷约束和家庭金融脆弱性两个中介变量。本文定义的信贷约束是指农村家庭面临的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根据CFPS数据库中“您家借钱金额较大时（例如用于买房、经营周转等），有没有被拒绝的经历?”和“被谁拒绝过?”两个问题进行识别。如果受访农户回答“有”且拒绝借款的是“银行或者非银行正规金融机构”，则认为该农村家庭受到了正规信贷约束。根据CFPS所提供的数据，参考Brunetti et al.（2016）的研究，本文用“财务保证金”衡量家庭金融脆弱性，将其定义为家庭收入加上流动性资产减去预期和非预期支出。表达式如下：

$$FM_{i,t} = Y_{i,t} + LA_{i,t} - EE_{i,t} - UE_{i,t} \tag{1}$$

$$EE_{i,t} = CL_{i,t} + DP_{i,t} \tag{2}$$

其中，i代表家庭个体，t表示观测年份。$FM_{i,t}$表示家庭财务保证金；$Y_{i,t}$表示家庭总收入；$LA_{i,t}$表示流动性金融资产；$EE_{i,t}$和$UE_{i,t}$分别表示家庭的预期支出和非预期支出。其中，预期支出包括家庭的生活成本$CL_{i,t}$（如日常消费支出）和固定债务偿还$DP_{i,t}$（如房贷支出等），非预期支出包括家庭的医疗与耐用品修复支出等。

基于上式，家庭金融脆弱性可表示为：

$$Pr(d_i = 1) = Pr(FM_{i,t} < 0) \tag{3}$$

其中，d_i表示家庭金融脆弱性。当家庭财务保证金$FM_{i,t} < 0$时，家庭将存在金融脆弱性。

5. 调节变量

本文引入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以分析其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数字金融的测度使用滞后一期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社会资本指代家庭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取的信任、互惠及资源支持。基于CFPS数据库，本文选用农村家庭的人情往来支出与交通通信支出之和来衡量家庭的社会资本。各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根据前文所述，本文将农村家庭生计策略划分为农业型、非农型和兼业型三个类型，并以此构造家庭生计策略的虚拟变量，若某一生计策略赋值为1，其他则赋值为0。模型如下：

$$Livelihood_{i,t} = \alpha_0 + \alpha_1 EPU_{i,t} + \alpha_2 Control_{i,t} + \varthe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tag{4}$$

其中，i代表农村家庭，t代表观测年份。$Livelihood_{i,t}$代表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类型，$EPU_{i,t}$代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ontrol_{i,t}$为控制变量，ϑ_i为省份固定效应，λ_t为时间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为随机误差项。

2. 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传导机制，本文借鉴江艇（2022）中介效应检验的思路，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M_{i,t} = \beta_0 + \beta_1 EPU_{i,t} + \beta_2 Control_{i,t} + \varthet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tag{5}$$

其中，$M_{i,t}$表示中介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式（4）一致。

此外，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是否受到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的

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到模型(4)中，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Y_{i,t}=\alpha_0+\alpha_1 EPU_{i,t}+\alpha_2 Z_{i,t}+\alpha_3 EPU_{i,t}\times Z_{i,t}+\alpha_4 Control_{i,t}+\vartheta_i+\lambda_t+\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Z_{i,t}$表示调节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与式(1)一致。

表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农业型	是否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是=1，否=0	11 569	0.239	0.426
非农型	是否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是=1，否=0	11 569	0.545	0.498
兼业型	是否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是=1，否=0	11 569	0.216	0.4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除以100并滞后一年	11 569	1.922	0.185
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5；本科=6；研究生及以上=7	11 569	2.161	1.050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1；很健康=2；比较健康=3；一般=4；不健康=5	11 569	3.201	1.281
性别	男=1；女=0	11 569	0.566	0.496
现金和存款	家庭持有的现金及存款总额(万元)	11 569	1.929	3.864
贷款	家庭待偿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万元)	11 569	0.337	1.448
农机价值	家庭拥有农机的价值(万元)	11 569	0.263	0.618
耐用消费品价值	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的价值(万元)	11 569	1.796	3.614
房屋价值	家庭拥有房产的价值(万元)	11 569	13.799	17.421
自有土地	是否拥有土地：是=1；否=0	11 569	0.926	0.262
信贷约束	是否有信贷约束：是=1；否=0	11 499	0.055	0.227
家庭金融脆弱性	家庭财务保证金是否小于0：是=1；否=0	11 351	0.406	0.491
数字金融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11 569	2.087	0.504
社会资本	人情往来支出与交通通信支出之和(万元)	11 569	0.717	0.815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其中，列(1)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系数为−0.234，在1%的水平上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增加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农村家庭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意愿。列(2)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使农村家庭转向非农就业以增加收入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列(3)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兼业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不显著。兼业型生计策略本身结合了农业和非农活动，其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可以部分抵消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不明显。综上所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农村家庭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促进家庭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假说1a和假说1b得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的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这是因为物质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的家庭更易从事传统农业活动，从而倾向于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同时，土地可通过流转、抵押等方式转化为资本，为非农创业提供资金，并作为风险保障增强农户从事非农活动的信心，进而促进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而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抑制农村家庭的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此类生计资本较高的家庭更易在非农领域获得就业机会，从而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农业型	（2） 非农型	（3） 兼业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0.234*** （0.071）	0.144** （0.066）	0.075 （0.075）
边际效应	−0.069***	0.055**	0.020
文化程度	−0.020 （0.013）	0.111*** （0.012）	−0.133*** （0.014）
健康状况	−0.054*** （0.010）	−0.034*** （0.009）	0.102*** （0.011）
性别	0.199*** （0.027）	−0.246*** （0.024）	0.132*** （0.028）
现金和存款	−0.003 （0.004）	0.013*** （0.003）	−0.016*** （0.004）
贷款	0.017* （0.009）	−0.014 （0.009）	0.003 （0.010）
农机价值	0.228*** （0.020）	−0.126*** （0.020）	−0.123*** （0.027）
耐用消费品价值	0.009** （0.004）	−0.007** （0.004）	−0.022*** （0.005）
房屋价值	0.005*** （0.001）	−0.005*** （0.001）	−0.002** （0.001）
自有土地	0.504*** （0.061）	0.197*** （0.045）	−0.579*** （0.04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549*** （0.154）	−0.375*** （0.140）	−0.585*** （0.158）
观测值	11 569	11 569	11 569
R^2	0.0392	0.0240	0.050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处理

鉴于模型存在潜在的遗漏变量、测量偏误、反向因果问题，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两个工具变量：一是选择同年度相邻省份所在区域（全国划分为七大地理区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丁淑娟和席昌明，2023）。相邻省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通过经济溢出效应或信息扩散等渠道影响本省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即工具变量与本省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度相关。但省级经济政策通常仅适用于本省份，不会直接影响相邻省份农村家庭的生计策略选择，满足外生性条件。二是参考陈瀚斌和张浩（2023）的方法，系统整理农村家庭受访年份之后一年内省级领导人的变更情况，以农村家庭所在省份的相邻省份领导人是否变更的变量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省委书记和省长在该省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其施政理念的差异往往导致政策取向的显著变化，因而省级领导人的更替通常会引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且相邻省份之间存在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从而确保了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领导人更替主要影响本省份的经济发展，对相邻省份农村家庭的直接影响较为有限。本文选取的是农村家庭受访后一年省级领导人变更情况，排除了领导人更替本身对农村家庭的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此外，对其进行外生性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外生性Wald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同时AR、Wald的P值均显著，表明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以上检验结果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结果表明，经过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系数依然显著，且符号与前文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②]

本文运用三种方法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是否稳健：第一，增加遗漏变量。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额外控制了家庭成员规模、家庭总收入以及家庭所在城市的人均GDP三个变量，发现结果仍稳健。第二，替换模型。使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与前文得到的结论一致。第三，替换解释变量。本文用Davis et al.(2019)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同时滞后一期以检验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与前文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结果稳健。

（四）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本文分别使用中介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探讨其影响机制。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兼业型生计策略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在本部分只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农业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

1.信贷约束的中介效应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信贷约束是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通过信贷约束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根据模型(5)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列(1)(2)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型生计策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与非农型生计策略显著正相关。列(3)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信贷约束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加剧了家庭的信贷约束。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贷款的违约风险升高，会抑制银行信贷供给，农村家庭的信贷约束随之升高，从而抑制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促进非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

2.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中介效应

家庭金融脆弱性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中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列(4)(5)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型生计策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与非农型生计策略显著正相关。列(6)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家庭金融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的置信区间上显著，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越高。这是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导致农村家庭资产贬值，家庭收入减少，加剧了家庭金融脆弱性。综上所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信贷约束和家庭金融脆弱性抑制农村家庭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促进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至此，假说2得证。

表4 中介效应检验：信贷约束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变量名称	信贷约束			家庭金融脆弱性		
	(1)	(2)	(3)	(4)	(5)	(6)
	农业型	非农型	信贷约束	农业型	非农型	家庭金融脆弱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0.235***	0.148**	0.635***	−0.235***	0.148**	0.334***
	(0.069)	(0.064)	(0.119)	(0.069)	(0.064)	(0.1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615***	−0.296**	−3.386***	−0.615***	−0.296**	−0.545**
	(0.151)	(0.138)	(0.265)	(0.151)	(0.138)	(0.255)
观测值	11 569	11 569	11 499	11 569	11 569	11 378
R^2	0.0300	0.0176	0.0522	0.0300	0.0176	0.1725

② 囿于篇幅，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3. 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为识别数字金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中的调节效应，本文运用模型(6)设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交互项的系数可以解释为数字金融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5所示，列(1)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互项系数为−0.313，在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说明数字金融发展会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的抑制作用。列(2)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会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假说3得证。

表5　调节效应：数字金融

变量名称	(1) 农业型	(2) 非农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0.299*** (0.079)	0.165** (0.071)
数字金融	0.002 (0.086)	−0.303*** (0.08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字金融	−0.313** (0.147)	0.320** (0.1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424* (0.232)	0.045 (0.209)
观测值	11 569	11 569
R^2	0.0396	0.0256

4. 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

本文利用模型(6)设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来分析社会资本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农村家庭生计策略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列(1)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社会资本的提高对于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无明显作用。列(2)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系数为0.27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假说4得证。这可能是因为较高的社会资本会拓宽农户的就业渠道，更有利于农户选择非农就业，从而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家庭带来促进作用，而对本身是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家庭影响不大。

表6　调节效应：社会资本

变量名称	(1) 农业型	(2) 非农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0.234*** (0.071)	0.162** (0.066)
社会资本	0.005 (0.021)	0.116*** (0.020)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社会资本	−0.003 (0.110)	0.276*** (0.1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550*** (0.155)	−0.459*** (0.142)
观测值	11 569	11 569
R^2	0.0392	0.0267

（五）异质性分析[③]

1. 区域异质性

我国地域广袤，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区别。为深入分析区域异质性特征，本文将25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④]，分别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农业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对农业型生计策略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且农村家庭具备更强的风险缓冲能力，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对农业依赖度高、风险应对手段有限。对非农型生计策略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农村家庭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则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非农收入是农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可能会裁员或降薪，直接威胁农村家庭收入。因此，农户被迫回流农业，以土地收入作为最低保障，表现出更强的风险规避。而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滞后、农业收入波动大，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带来非农就业机会增多，促使农户转向非农就业。

2. 户主年龄异质性

为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本文基于户主年龄对农村家庭样本进行划分。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年轻劳动力在非农就业市场的活跃度和适应性明显更高，而中老年劳动力则更倾向于留守农业或本地就业。因此，参考刘长庚和罗午阳(2019)的划分方法，将农村家庭分为青年家庭(户主年龄在45岁以下)与中老年家庭(户主年龄在45岁及以上)两类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对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类家庭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中老年家庭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青年家庭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中老年家庭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在中老年家庭的收入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占比较大，其收入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较小。同时，由于技能匹配不足、接受新技术的能力有限等原因，中老年家庭在不同类型非农工作之间进行转换时面临的困难比青年家庭更大，制约了其采取非农型生计策略的积极性和能力。

3. 人力资本异质性

人力资本是家庭发展的核心资产，是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能有效推动农户收入增加，且较高质量的劳动者更易接受新兴事物。为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本文以户主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将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划分为“高人力资本组”，高中以下的划分为“低人力资本组”。结果表明，对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无论农户人力资本水平高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于低人力资本组的影响更为显著；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人力资本组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农业生产风险、降低预期收益，但由于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通常缺乏风险应对能力和资源禀赋，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而高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的劳动力通常具备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技能适应性和就业灵活性，能够更好地把握政策变动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家庭的生计策略更易向非农型转变。

③ 囿于篇幅，异质性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④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与常用做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东部经济带)、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4. 收入水平异质性

在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家庭的缓冲能力和生计策略选择空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为进一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收入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本文参照黄倩等(2024)做法，以农村家庭年度总收入的中位数为界，将全部样本分为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两个组。结果显示，对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无论家庭收入水平高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产生负向影响，但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显著；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正向影响低收入水平的家庭。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多元化程度较高，其收入主要来自非农领域，对单一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较低，因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农业型和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均不显著。而低收入家庭大多从事农业生产，且风险抵御能力相对较弱，经济政策变化会促使其更通过寻求非农就业来规避农业经营风险。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2014、2016和2018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进行分类，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信贷约束和家庭金融脆弱性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造成影响，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均能够正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村家庭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西部地区、青年户主、低人力资本和低收入农村家庭的农业型生计策略具有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青年户主、高人力资本和低收入农村家庭的非农型生计策略选择促进作用更显著。

（二）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宏观调控机制。为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政府部门应科学调控政策实施的强度与频度，维持经济调控措施的连贯性与稳定性。首先，政府应建立健全政策影响评估与动态监测机制，加强对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的模拟与预警，特别是在农业支持、农村金融、就业促进等关键领域，及时监测经济政策调整对农村家庭的潜在影响，确保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其次，政策制定应更多考虑区域差异和家庭禀赋差异，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帮助。重点关注与帮扶中西部地区、低人力资本和低收入农村家庭等群体，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针对政策不确定性下信贷约束更大的弱势群体，通过定向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激励金融机构优化涉农信贷服务，缓解其融资约束。最后，建议设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协同配合，避免因政策叠加或冲突增加不确定性。

第二，深化数字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中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实施农村数字基建攻坚计划，重点推进中西部及偏远地区网络覆盖，确保农村家庭能够稳定、低成本地接入数字世界，消除“接入鸿沟”，为数字金融服务的普及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开展针对性强的数字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升农户特别是中老年群体对正规数字信贷、保险等工具的理解与使用能力。另一方面，创新数字信贷与风险管理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开发更适合农村家庭生计周期与风险特征的信贷产品。推广普惠型数字保险，帮助农村家庭管理农业风险与意外支出冲击，降低其金融脆弱性。

第三，推进农村社会资本培育与组织化提升工程，将非正式关系网络转化为结构化资本。政府应引导并组织农户参与合作社、社区志愿活动，拓展社会网络，促进信息共享、资源互助和风险共担，增

强家庭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自救和互救能力，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此外，政府应对老年群体开展重点帮扶，为其设立专门的帮扶小组并进行数字金融知识的入户宣传教育，提高其风险应对能力。针对青年户主和高人力资本群体，为其创造良好的创业和创新环境，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支持和税收优惠，发挥其示范带动效应。

参考文献

[1] 宋文豪, 黄祖辉, 叶春辉.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6): 92-113.

[2] 金雪军, 钟意, 王义中. 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后果[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4(2): 17-26.

[3] 丁士军, 张银银, 马志雄.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6): 25-34.

[4] 许志伟, 王文甫.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实证与理论的动态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9, 18(1): 23-50.

[5] 刘逢雨, 赵宇亮, 何富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庭资产配置[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9, 34(4): 98-109.

[6] 赵文娟, 杨世龙, 徐蕊.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新平县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S2): 162-165.

[7] 伍艳.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江县的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3): 88-94.

[8] 董晓林, 熊健.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71-77.

[9] 王修华, 赵亚雄.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金融可得性差异[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1): 44-60.

[10] 王小华, 马小珂, 何茜. 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11): 21-39.

[11] 温涛, 刘亭廷. 数字金融使用能缓解城乡家庭金融脆弱性吗[J]. 金融经济学研究, 2025, 40(1): 39-59.

[12] 田鸽, 张勋. 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J]. 管理世界, 2022(5): 72-83.

[13] 谭卓敏. 数字金融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收入不平等视角的实证检验[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15.

[14] 涂冰倩, 李后建, 唐欢. 健康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脆弱性——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方经济, 2018(12): 17-39.

[15] 张蕴晖, 赵伟. 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差异性的影响——基于生计资本关系动态变动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3): 159-168.

[16] 周广肃, 樊纲, 申广军.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4(7): 12-21+51+187.

[17] 张俊华, 花俊国, 唐华仓, 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产品价格波动[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5): 110-122.

[18] 尹志超, 谢海芳, 魏昭. 涉农贷款、货币政策和违约风险[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3): 14-26.

[19] 李玉山, 卢敏, 朱冰洁.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经验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5): 60-82.

[20] 杨明婉, 张乐柱, 颜梁柱. 促进还是阻碍: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影响[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4(3): 110-120.

[21] 赵亚雄, 王修华. 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J]. 金融研究, 2022(10): 77-97.

[22] 黄倩, 刘泽慧, 熊德平. 数字金融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J]. 改革, 2024(8): 98-118.

[23] 李晓嘉, 蒋承. 农村减贫: 应该更关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J]. 经济科学, 2018(5): 68-80.

[24] 廖理, 李梦云, 王正位. 借款人社会资本会降低其贷款违约概率吗——来自现金贷市场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0): 5-23.

[25] 王君涵, 李文, 冷淦潇, 等.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10): 143-153.

[26]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14.

[27] 丁淑娟, 席昌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J]. 中国经济学, 2023(4): 35-64.

[28] 陈瀚斌, 张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J]. 经济学报, 2023, 10(2): 115-152.

[29] 刘长庚, 罗午阳.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金融排斥——基于CHFS2013的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 2019, 36(2): 141-148.

[30] 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

[31] Bordo M D, Duca J V, Koch C.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credit channel: Aggregate and bank level U. S. evidence over several decad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6(26): 90-106.

[32] Brunetti M , Giarda E , Torricelli C. Is financial fragility a matter of illiquidity? An appraisal for Italian household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6, 62(4): 628-649.

[33] Davis S J, Liu D, Sheng X 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China since 1949: The view from mainland newspapers[R]. Present at the Fourth Annual IMF-Atlanta Fed Research Workshop on China's Economy, Atlanta: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2019.

[34] Liu Y, Liu C, Zhou M. Do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or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Research based on the Chinese family database (CFD)[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1, 13(2): 475-494.

[35] Walelign S Z, Pouliot M, Larsen H O. Combining household income and asset data to identify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ir dynamic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53): 769-787.

[36] Yu J, Shi X, Guo D, et 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PU) and firm carbon emissions: Evidence using a China provincial EPU index[J]. Energy Economics, 2021(94): 1-11.

（责任编辑：胡英彬）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gital Finance and Social Capital

LIU Wei, NIU Wenq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is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sidents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Utiliz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4, 2016, and 2018,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PU) on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t the micro leve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PU discourages rural households from adopting agriculture-bas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while promoting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finance and social capital play moderating roles in this process. Furthermore, EPU suppresses agriculture-based strategies by exacerbating credit constraints and increasing household financial fragility, while facilitating non-agricultural strategies through these same channel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EPU on agriculture-based strategies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household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ose with younger household heads, low human capital, and low-income families. Conversely, the promotive effect on non-agricultural strategies is stronger for household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ose with younger household heads, high human capital, and low-income famili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policymakers should prioritize the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of economic policies, carefully calibrate the pace and intensity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dvance digit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optimize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o foste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digital finance; social capital